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二編 9

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 小說中的貧困書寫

以社會事業作為參照閱讀的策略

石廷宇・著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輯刊

二 編

第 9 冊

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小說中的貧困書寫
——以社會事業作為參照閱讀的策略

石 廷 宇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小說中的貧困書寫——以社會事業作為
參照閱讀的策略／石廷宇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
出版社，2013〔民102〕

目 4+260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初編：第9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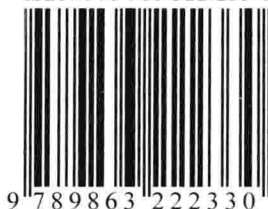
ISBN：978-986-322-233-0（精裝）

1. 臺灣小說 2. 文學評論

733.08

102002846

ISBN-978-986-322-233-0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二 編 第 九 冊

ISBN：978-986-322-233-0

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小說中的貧困書寫 ——以社會事業作為參照閱讀的策略

作 者 石廷宇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3 月

定 價 二編 28 冊（精裝）新臺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作者簡介

石廷宇，現為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專攻殖民地時期臺灣、滿洲國文學比較；後殖民批評與閱讀書寫、民俗學，及現當代文學批評與創作（小說為主）。共同著作有陳姪媛主編，《看不見的殖民邊緣：日治邊緣史讀本》（玉山社，2012），另有單篇論文：〈矛盾的殖民地文化生產：《臺灣歲時記》與《滿洲歲時記》中「和製歲時」的離地性〉、〈「覽爛查某」的性別關係：日治中期臺灣歌仔冊中女性負面形象再思考〉等篇。

提 要

本書藉由爬梳日治時期臺灣社會事業的史料及論述，比較殖民者與受殖者雙方對於社會事業的認知與詮釋，策略性地重讀殖民地文學文本、開拓殖民地文學「貧困書寫」研究的可能詮釋。以「文學研究」為主，「社會事業研究」為參照框架，重新檢視殖民地社會事業與臺灣人的關聯性。文化層面上，臺灣人知識份子通過挪用帝國社會事業內部的知識體系與統治者話語，在被帝國視線所給定的「窮民」、「失業者」形象背後，重構一套透過「貧困書寫」所編碼的話語體系，迴避帝國事業通過福利話語進行的收編策略。文學表現上，殖民地文學作品中的「窮民」與「失業者」形象皆表現出與統治者社會事業期待有所差異的「貧困」形象。藉由形塑形象認知上的衝突，移植作為解讀小說內部意涵的方法論，以掌握文學創作中蘊含的精神性脫殖民意象，得出與殖民帝國所規劃、形塑的殖民地空間、受殖者形象相互爭奪的詮釋話語。

通過對殖民地文學中「窮民」及「失業者」形象進行認識與研究，本書試圖開啟帝國視線下殖民地受殖者形象的「複數」思考，在採取後殖民閱讀（Postcolonial Reading）的方式進行重新詮釋後，提供觀察殖民地文學中的人物形象的可能「讀法」——殖民地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作家群精神脫殖民的「貧困書寫」模式。

感 謝

寫在這本書即將被翻閱之前。

他花去了很多時間思索感謝的成份。

裡面包含感激、包含寬容、包含鼓勵、包含誠懇、以及內含關愛成份的數落與責難，以及完全的愛。他覺得可能不止，卻暫時想不起其他。

接著他發現到自己所能撰控的文字，似乎不足以回應這些亟待感謝的部份。只能在闔上本書之前，告訴自己，以及將來翻閱這本書的每個人，他並沒有愧對這本薄薄的書冊，在這幾年光陰，任荏苒的荏苒，如梭的如梭，因為某些東西被記載、被完成於書中，他好像也就把自己的某些部份寄託在這之中，聊以做為某種堪稱為謝辭的第一段了。

可是，在第二段的開頭，他卻突然氣起尚顯無能的自己，竟然還不能如他所仰慕的詩人白居易般，寫出讓人人得而識知乏的論文，他顯得沮喪，卻也更以此砥勉自己。然後重新開始一段新的旅程。他說他有一天要走出這裡到別的地方去，不同的自己、不同的思索、不同的做法、更多更完整地與整個世界與社會融在一起。

他決定花更多時間思索感謝的對象。

那是在意識到，自己所累積的一切皆來自前人的那一刻，一篇小說、一段詩、一本論文、一個推論、一種視角。他確信他就在歷史之中。他僅是站在每一位經歷歷史現場的前人所留下的字句與思想的肩膀上，如履薄冰地捧著字句，吟詠著他們的思想與光。藉此他才能看得稍微再遠一些，或者稍微再廣袤一些。或者只是再遠一些。

然後，他想起那些曾啟發他的每一吋心智的諸位師長們、那些曾雄辯與曾真誠詰難的戰友們、那些在異地寄予關愛的友人，因為有了他們一點一滴地澆灌著自己，方才能結成眼前這片穗與實。

是你們令他成為金黃色的。他只更加感覺自己是透明的，是渺小的。

這本書原就存在。只因你們，他方能使它從無垠的文字中一一浮現。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及意義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5
一、論文的「研究方法」	5
二、殖民地文學文本的「讀法」	7
第三節 前行研究回顧與問題提出	9
一、與殖民地社會事業相關的研究	9
二、與「受殖者形象」相關的文學研究	17
第四節 章節說明與架構	21
一、章節說明	21
二、章節架構	23
第二章 社會事業的認知衝突與建構——「窮民」 作為話語爭奪的場域	27
第一節 權力與話語——社會事業的認知衝突	28
一、社會事業的內在矛盾——雖「殖民」卻 「福利」的事業	28
二、帝國話語中的社會事業——以「預防」 與「修補」社會問題爲目的的事業	34
三、「社會事業」的認知衝突——殖民資本 主義、差別待遇與治理失效的事業	38

第二節 殖民地話語挪用——帝國社會事業中的「社會連帶」	49
一、帝國話語中的「社會連帶」——提供殖民地「向上想像」的可能	50
二、受殖者話語中的「社會連帶」——權力話語挪用與重構	52
第三節 社會救護事業下的認知建構——「窮」與「窮民」	61
一、受救助「窮民」＝「帝國臣民」？——社會事業與「皇民化」	63
二、「窮」——帝國與受殖者認知衝突	67
三、殖民社會排除與「貧窮」文化	71
第三章 殖民地小說中的複數「窮民」形象	81
第一節 土地喪失——淪為生命共同體的農民與「窮民」	83
一、「窮民」作為殖民地文學研究的方法	83
二、「土地喪失」——連結「農民」與「窮民」的生命線	89
三、「不符規則的」窮民——受殖者「窮民」屬性建構	96
第二節 連帶精神下的文化斷裂——父母雙亡、鬻子及離鄉書寫	101
一、父母雙亡	102
二、鬻子	106
三、離鄉	111
第三節 消解「社會排除」與社會事業意圖的敘事——離農轉工	115
第四章 殖民地式經濟體制下的「異」、「己」失業者論述	125
第一節 米糖經濟與殖民地失業問題	127
一、統治者的失業觀察——作為農、工失業主因的米糖經濟	127
二、受殖者的失業觀察——肇因於「社會的原因」的失業	134

第二節 總督府「經濟保護」事業的意圖、形態 及台灣人的反應	139
第三節 殖民地失業者差異論述	152
一、殖民地失業者屬性	152
二、勞動力轉化	165
第五章 勞力至上，忠誠未滿——論殖民地作家 筆下的「受殖失業者」形象	171
第一節 被詛咒的失業者——翻轉傳統的殖民地 失業者詮釋方式	173
一、過去殖民地文本分析中的勞動者失業	174
二、複數意涵的受殖失業者形象	178
第二節 自殖民體制中解放的失業者形象	191
一、「離散」作為「主體奪回」的一種策略： 楊守愚〈一群失業的人〉	193
二、「身份」作為一種策略：孤峰〈流氓〉	195
三、「帝國內部他者」作為一種策略：楊達 〈送報伙〉	197
四、「殖民農場」作為一種策略：翁鬧〈憨 伯仔〉	199
第三節 負數勞動力	203
一、「疾病」作為勞動力弱質化的書寫策略	208
二、「死亡」作為勞動力解放的書寫策略	211
第六章 結 論	219
第一節 「社會事業」作為文學閱讀的參照	219
第二節 以「殖民地社會事業」重新閱讀東亞殖 民地文學的可能	221
第三節 結論——後殖民閱讀殖民地文學的可能 性	222
參考書目	225
附 錄	237
一、殖民地身份建構與身份流動 / 作品貧困書寫 示意圖表	237
二、照片	238

圖 1-1：於台北縣設立的台北仁濟院（1899 年 5 月）	238
圖 1-2：台北失業救濟所：台北市御前町（今台北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附近）	238
圖 1-3：高雄入船町（今鹽埕區）社會事業中的住宅供給事業	239
圖 1-4：嘉義鄰保館授產工作情形	239
圖 1-5：台中佛教會館附設「愛生院」	240
圖 1-6：〔台灣〕總督府殖產局推出的明信片（ポスター）——二百萬の夏帽子も此の纖手より	240
圖 1-7：嘉義市方面委員會	241
圖 1-8：〔朝鮮〕社會事業中的恩給（授產）事業——機業場〔京城〕（今首爾）	242
圖 1-9：〔朝鮮〕社會事業中的恩給（授產）事業——機械傳習〔江原道〕（今朝鮮半島東部）	242
圖 1-10：〔朝鮮〕社會事業中的恩給（授產）事業——漁業傳習〔全羅南道〕（今朝鮮半島西南部）	243
三、文件	244
圖 2-1：劉明朝，〈社會連帶論〉，《台灣青年》第 2 卷第 5 號、第 3 卷第 1、3、5 號，1921 年 6 月 15 日、7 月 15 日、9 月 15 日、11 月 15 日（節錄）	244
圖 2-2：劉明朝，〈社會連帶論〉	244
圖 2-3：杵淵義房《社會事業史》中關於社會事業實行目的的引文（節錄）	245
圖 2-4：東京帝國大學研究室教授 文學博士 戶田貞三〈台灣社會事業的現代意義〉（節錄）	245
四、表列	246
表 1：《台灣（新）民報》中關於社會事業的批評（表列）	246
表 2：台灣新文學中小說主題表	251
索引	25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目的及意義

本論文的撰寫方向，分為兩部份，其一，對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作品中的小說〔註1〕進行有系統、有方向性地重新閱讀；其二，通過重讀，參照前行學者較少觸及與比對的殖民地史料——「殖民地社會事業」〔註2〕，結合當時代的台灣文化活動、社會運動情形，提出一套重新詮釋殖民地文學內部意象的方法。

首先，在殖民地文學研究方面，對於殖民地時期台灣新文學中的小說作品研究，在探討歷史現場中作家的書寫情形時，常傾向將活動在作品中的人物（角色），視為靜止的、為議題服務性質的「物件」（object），包括如：突顯統治者暴虐與不義形象、展演殖民地文化活動情形、從故事內容向律法制度面延伸，以表現失效的殖民政策與治理瑕疵問題等。我們若是重新檢視過去以作家作品為主要討論對象的研究，大部分著力點多集中處理作家刻劃的「受

〔註1〕 本文所討論的文類，皆以「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中的「小說」為主，對象則是以台籍作家所創作的作品為主，以下不再特別說明。

〔註2〕 日本統治初期至1920年以前，仍因襲台灣清領時期的舊慣，對台灣下層社會的「救恤」行為以「社會救濟」稱之。由於殖民統治政策「社會事業」，有其因歷史分期的差異，而有稱謂上的區別。因此，除特定敘述需要外，本論文內所標誌的「社會事業」一詞，皆是指（1920～1937）年間的帝國經過現代化、體系化實施的「社會事業」。若有易於誤讀之處，筆者再另行加註說明。以下「社會事業」，所指稱皆為「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社會事業」（1920～1937），以避免不必要之贅詞絮語，影響閱讀節奏。

殖者形象」這一命題。

近年來，雖然學界積極拓展多元觸角，嘗試做出更大向度跨學科、跨區域的連結比較研究如：區域性殖民地時期的東亞比較研究；或是援引社會學、心理學等方法論，使得殖民地時期文學研究的深度、廣度都有所擴充，卻連帶使得在文學文本的「文學性」分析方面，有逐漸淡化與失衡在諸多議題、理論取向的論述中的傾向。

隨著「受殖者」形象被認知的方式從早期的「壓迫／反抗」、「抵抗／屈從」的二元對立結構，到「協力」、「模糊／曖昧化」等多層化分析視野，乃至於近期學界關注的「地方文化甦生」情形，當歷史資料的出土數量逐漸完備，研究方法也逐日精進，使得殖民地現場的受殖者位置與形象，開始必須被以流動的、多變的視角多面向地切片時，作品中受殖者的身份與屬性，是否也有被重新檢視、觀看和思考的可能與必要，是本文亟待面對並跨越的挑戰。

尤其在前行學者苦心孤詣地耕耘和摸索中，有越來越多綜合性比較研究，仔細地刻畫出受殖者在承受來自殖民者的統治壓迫時，通過各種形式所展現的對話力道。其中部份力道，甚至往往在帝國殖民史的關鍵時期，造成舉足輕重的影響，如對 1930 年代台灣知識份子所興起的「鄉土文學論爭」背後動機的研究，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註 3〕}種種具開創性與突破性的前行研究成果，都促使後輩學者不得不持續並且更在地地思考；在這樣意義多變而流動的詮釋方法與研究環境中，對於殖民地時期文學中的受殖者形象與身份，是否還能因為研究者對史料的解讀面向與深度的不同，而產生更多閱讀與詮釋上的可能性？

第二，台灣在歷經日本初據台（1895），總督府實施軍政體系，採取一連串強有力的武力鎮壓以後，無論在經濟、政治及社會文化上，都處於疲敗與斷裂的狀態；本土領導階層與反對勢力，在經過 1915 年 5 月的「西來庵事件」後，也不再採取與殖民者正面衝突的反抗手段，轉而以深層的文化活動與統治者周旋。其中，雖然不乏有傾心日本，與日本「協力」的本地既得利益者與資產階層，但諸多有識之士，仍孜孜矻矻企圖通過文化抵殖民的方式，在殖民母國與殖民地文化傾軋交混的縫隙中，替殖民地文化主體尋求發

〔註 3〕可參考，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台灣鄉土觀念問題〉，《聯合文學》第 158 期（台北：聯合文學，1997 年 12 月），頁 77～82。

聲的機會。

大部分的時間裡，這種爭奪發聲位置與話語權的情形，與其說是由受殖者主動尋找、開創出來，不如說是由於日本屢屢在其殖民施策的過程中，暴露出政策擺盪與失效的裂縫，才使台灣人得以在其中找到可以利用與切入的空間。這類殖民帝國統治自曝其短的情形，幾乎在每個殖民時序的關鍵時間點上，都可以觀察得到，如前述的「西來庵事件」（1915），在日本大規模掃蕩武裝抗日份子後，雖然表面上壓制了受殖者「明的」與殖民者間的對抗關係，卻因此使受殖者的活動軌跡，得以跳脫出「壓迫／反抗」二元結構外，另闢出能夠容納更多可能性的「文化抵殖民」路徑。或如皇民化時期帝國所推展的「地方文化」（1941），提供了台灣知識份子得以藉由「地方」，重新找到殖民地發言位置的合法性等等。

1905 年，當日本的殖民地「基礎建設工程」〔註 4〕大致告一段落後，台灣已初步完成了進入「現代化社會」〔註 5〕的準備工作，包括實施一連串治理相關的法規如：地方改制、司法行政制度確立、鋪設鐵道、對原住民的治理政策方針、醫療政策、戶籍制、地租規則等，以及針對殖民地與內地關係所施行律令「第六十三號法律」（1896）、特別會計制度（1897）、三段警備法等。在這個治台之初的漸進主義時期裡，又以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施政，扮演了舉足輕重的分水嶺作用。

自 1898 年起，由他們兩人所主導推行的一連串殖民地調查及建設政策，打下了往後殖民經濟發展的許多重要基礎，諸如土地調查（1898）〔註 6〕、保甲制度（1898）〔註 7〕、舊慣調查（1901）〔註 8〕、治安警察法（1900）、金融財政方面的統一貨幣、設立台灣銀行（1897）、陸續實施的各項專賣制度，以

〔註 4〕 涂照彥從法制面如保甲制度、警察制度、貨幣金融制度；調查面如土地調查、舊慣調查等為日後帝國殖民地經濟體制鋪路的措施中分析，認為 1895 年至 1905 年期間「恰是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作」時期」。參考，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1992 年 3 月），頁 33～53。

〔註 5〕 本文以下「現代性」（modernity），除原文（日文）部份維持原用語「近代性」，其餘全都以「現代性」統一稱之。

〔註 6〕 總督府在台施行的土地調查事業（1899.7～1905.3.31）有如：「律令第 13 號台灣地籍規則」、律令第十四號「台灣土地調查規則」，律令第 15 號「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規則」。

〔註 7〕 1898 年 12 月律令第 21 號「保甲條例」施行。

〔註 8〕 1901 年 10 月 25 日，發布「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規則」，敕令第 196 號公佈——設置台灣臨時舊慣調查會。臨時台灣舊慣調查開始，至 1906 年結束。

及有關殖民治理的戶口調查（1903）〔註9〕等。其中，最為重要的，則是有關糖業經濟的相關舉措。凡此種種，無不為日本在台的經濟發展，儲下了相當程度的能量。

也正好於此時期間，總督府首次主動針對台灣社會結構中的「下層階級」（underclass）〔註10〕做出反應，通過1899年9月設置的「台北仁濟院」〔註11〕，展開有別於殖民統治壓迫型態的另一個面向——作為現代性殖民資本主義補強措施的「社會救濟」。

本文企圖從上述這個特殊的歷史事件與時間點出發，思考總督府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及環境底下，開始在施行殖民地式經濟體制政策的過程中，展開對殖民地社會中的下層階級的「關心」？這種由殖民者所推行的社會救濟，及帝國於1920年代後，由消極的社會救濟轉而積極的「防貧」的社會事業，對受殖者產生哪些影響？我們能否在殖民地時期的台灣文學、文化活動中，觀察到這些因統治者意圖而被迫承受、改變的受殖者活動態樣、身份，而他們又表現出何種形象？這些殖民地文學、文化中的受殖者形象，是否會因為我們理解了這種統治者具特殊意涵的殖民政策後，產生了可能的詮釋位移？

在認識到日本帝國現代性資本主義式殖民掠奪本質後，我們已經對當時的台灣人所遭受到的政治、社會、教育與經濟等方面的全面性壓制力道，有

〔註9〕1903年6月，台灣總督府公佈敕令第34號「戶口調查令」，限於1905年10月1日前，清查全台戶口。

〔註10〕本論文採用社會學中的「下層」（underclass）定義，作為討論對象的範圍指涉，主要是因為此處的論述立場，是站在殖民者的政策角度，認為實施「社會救濟」的目的，是用來救濟社會上陷入經濟、生活困境的「下層階級」，與「底層研究」（the Subaltern Studies project）中相對於「精英」階級的殖民地「底層」（the subaltern class）解釋有所不同，而較與本文所關注的殖民地社會事業的「政策施行對象」貼合，故採用之。參考王永慈，〈「社會排除」：貧窮概念的再詮釋〉，《社區發展季刊》第95期（台北市：內政部社區發展雜誌社，2001年9月），頁73。劉健芝、許兆麟編選，張雲箏、林得山譯，《庶民研究 Subaltern Studies》（北京：中央編譯，2005年5月），頁1～17。

〔註11〕1897年9月英照皇太后陛下崩殂後，皇室的御下慈惠賜金一萬五千金，予台灣作為慈惠救助之用，兒玉總督並捐其薪俸以號召各地響應，共募得捐助四千五百元，及於1899年於台北縣將艋舺養濟院與育嬰堂合併改設「台北仁濟院」，為日據時期在台灣所設立的第一所慈惠院。參考，杵淵義房，〈養濟院再興之兒玉總督諭示〉，《台灣社會事業史》（台北：德友會，1940年4月）（台北：南天書局，1991年）復刻，頁1141～1142。

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但是，在這種充斥殖民「下壓力」〔註12〕的統治結構中，受殖者們真的只能無止境毫無招架之力地，被殖民者一步步擠壓、碾碎成毫無糖分的甘蔗渣滓嗎？抑或是在統治者每一個特殊時間點與施策中，都可能有受殖者能應時而生的力道？

本文將從殖民地台灣的社會、經濟史與文化生產等面向切入，以總督府施行的社會事業論述與內涵，做為對照閱讀殖民地文學文本的方法。通過整理1921年至1937年間帝國在台灣施行社會事業，參照台灣人作家作品及報紙刊物中的論述等相關文學、文化資料，立體地重新觀察殖民地台灣，究竟台灣人作家如何看待帝國這項含有不尋常意義與動機的殖民政策，他們又如何以文學作為回應的媒介，又回應了什麼？有機地連絡殖民地經濟史、制度史、社會事業史與殖民地文學三者，統合性地對殖民地文學文化現象進行重新閱讀，反思帝國殖民政策對於文學創作的影響，開啓對過往已被定型的文學中的受殖者形象再詮釋的可能。

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共分為兩項：第一、以總督府社會事業內涵作為閱讀文學生產背景的參照；第二、殖民地文學文本的「讀法」。茲分成下列兩項進行說明：

一、論文的「研究方法」

首先要處理的，是以「帝國社會事業內涵做為閱讀文學生產背景的參照」這一研究方法。

過去，不乏有研究者從法律、醫療體系、衛生論述、教育等殖民地政策、體制層面切入，思考殖民政策的實施效能、進入到殖民地後發生的變化，以及對殖民地社會、受殖者產生的影響，並延伸至處理受殖者的回應，進而連結殖民地文學研究。然而，除了少數社會學研究者，有分別對殖民地時期的台灣社會事業進行建構式的研究，以社會事業作為觀察文學現象、分析文學文本的方法論方面，至今仍乏人間津。

有關社會事業的相關資料，在《台灣日日新報》、《台南新報》、《台灣時

〔註12〕此處所指的「下壓力」，指的是法律、經濟等具向下、壓制性格的統治政策。相較之下，「社會事業」所呈現的是救助、向上的性質。

報》、《台灣警察時報》，或是《台灣（新）民報》等報紙中，幾乎每日都有主題性、資料性或事件性的記載。尤其自 1930 年起，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開始對台灣產生影響後，以社會事業為報導對象的欄位，更有頻繁密集出現的趨勢。甚而至於有由官方所設立專門處理社會事業相關問題的「台灣社會事業協會」，以及其機關誌《社會事業の友》，聚焦刊登社會事業方面的相關訊息。因此，若我們仔細觀察社會事業體制的在台發展史，就其體制化的程度，及其作為殖民地諸多政策中的一項的曝光率來說，可說是絲毫不遜色於其他政策。

那麼，放眼社會事業眾多複雜且交錯的項目，又該如何取徑以連結殖民地文學研究？

本文企圖聚焦自 1920 年代初，殖民地社會原有的救濟制度，被總督府正式制度化、政策化為「社會事業」以後，至 1937 年進入戰爭期前，這之間社會事業內部所建構的統治者觀看殖民地受殖者的視線及其內涵。將社會事業觀看並定義受殖者的論述作為文學研究濾鏡，探求另一條詮釋殖民地時期作家作品內部意象系統、解讀殖民地社會文化情形的路徑。

在掌握文獻資料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到，在帝國菁英、學者、總督府官僚系統反覆藉由社論、報導等方式，定義社會事業「救助對象」的論述建構過程中，提供了筆者朝向文學研究進行連結的線索。當他們以論述交互限定、聚焦社會事業的救助對象時，所強調的「社會救助」下的「窮民」，以及「經濟保護事業」下的「失業者」，透露出了可以和殖民地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小說作品中大量出現的受殖者形象——「窮民」與「失業者」，進行連結與參照詮釋的可能。〔註 13〕

理論上來說，殖民地文學作品中所描繪的大量「窮民」和「失業者」，所指涉的，應該就是那群總督府社會事業所設定要救助的群體才是。然而，正因為如此，促使本文進一步對統治者和受殖者各自通過社論、報導、文學創作等方式進行描繪的受殖者形象——「窮民」和「失業者」，進行比較和分析。藉由比較帝國視線下的，可以被社會事業認定救助的「窮民」與「失業者」，與受殖者透過文學創作所書寫的「窮民」與「失業者」，從雙方的視線出發，比較兩者間的差異，試著建構出一套閱讀殖民地受殖者形象背後意義的框

〔註 13〕 由於資料分佈、閱讀與使用上的需要，本文除非特別註明，否則遇有引用的題名為「日文」、「英文」而內文為「中文」的引文時，皆為筆者自譯。

架，一種觀看殖民地文學意象的方式——「貧困書寫」。

過去，社會學及歷史學研究者在處理日治時期的台灣社會事業發展，甚至向前去研究清代台灣社會救濟情形時，大多從制度史或社會史、經濟史等角度，去剖析社會救濟、社會事業發生的條件和背景。因此，多將焦點聚集在殖民者施政的主動性、制度史爲主的研究範疇，至多談及統治者的施政意圖，以及與此相應的措施，〔註 14〕而未將「受殖者的反應」置於研究的主體位置，研究受殖者對於「社會事業」的回應、反應和政策的影響。這是筆者所深感到，在整體研究狀況上的不足。

因此，本文在分析殖民地台灣的「社會事業」對文學再現社會議題造成的影響時，主要便集中在對帝國治台的經濟策略、殖民地式經濟對台灣社會、文化造成的影響，以及對社會事業與經濟史、社會制度史等三方面進行連結。主要的意圖，則是爲了要強化、聚焦本文所欲處理的問題——殖民地社會事業脈絡下的「受殖者的反應及回應如何表現在文學之中」。

具體而言，即是受殖者的形象在文學生產中被建構、表述的過程，以及背後可能蘊藏的意義。透過研究、觀察受殖者在文化生產領域中具有自主性反應，重新思考過往論者因爲對殖民政策解析度上的差異而產生的，「受殖者形象」在內涵及詮釋上的不同。

透過這種研究方法，本文希望能在理解帝國社會事業內涵的同時，重新觀看向來被認知爲是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或是如 Homi K. Bhabha 所述，能透過「權力換算」來取得對話空間的受殖者群體，〔註 15〕並且思考這兩者之間有無透過這種「形象」建構而對話的可能，而這種對話又如何進行。

二、殖民地文學文本的「讀法」

擅於運用解構主義的權力話語透析後殖民語境的後殖民理論學者 G. C. Spivak，在《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中曾提及，所謂的「後殖民閱讀」(Postcolonial Reading)，是對過去幾乎已經被僵化地進行思考的部份殖民地作品，進行重新閱讀。她採取以「讀法」取代「策略」的閱讀方式，對部分殖民地文本進行「解構」。她強調，如此一來，才能夠還原某種被文本

〔註 14〕李健鴻，〈邊陲統制與倫理教化：台灣社會救濟體制形成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 6 月）。其文中討論的重點便放置在統治者的治理意圖和權力關係，容後討論。

〔註 15〕生安鋒，〈霍米巴巴〉（台北：揚智，2005 年），頁 49。

遮蔽的部份，例如「性別」、「族裔」等問題：

在此我運用解構的資源「以遂行此一解讀」，並發展一種閱讀的策略（而非理論）以匹配一種特定的閱讀情境，亦即引發一種對帝國主義的文學批判，儘管只是把這樣的意圖放在書本封面上就已經會招致其作為一項策略的被抹殺或中立化。以一種特定的方式，此種閱讀或許也將淪為它自己的獵物。〔註16〕

她並且說明，正是通過這種帶有傾向性的「閱讀政治」（Policy Reading），可以幫助我們掙脫既有的文本分析框架，從而理解到更具積極性、能動性的文本意涵：

我想特別去留意文本在比較後期的書寫與閱讀階段上運用了哪些修辭的動作。我希望透過這樣的關照可以指出，傳統的歷史脈絡化的詮釋很可能導出封閉的定論，這些定論就算是合理或充分的，卻還是很值得商榷的。〔註17〕

本文無意照本宣科式地，僅依附於一家之言的理論框架之下，作為自己研究的方法，而是企圖在學習前行後殖民研究者具前瞻性的視野及氣度中，學習以不同的角度重新觀看殖民地時期台灣文學文本。

在現今跨領域、跨學科的研究風潮，逐漸成為突破各類研究困境的首選方式之餘，對於文學文本的分析與詮釋，反而越來越被隱蔽在各式新穎、流行的研究語彙之中。殖民地時期的作家作品，非但有被學術界充斥的各種理論框架「工具化」的現象，更有為了闡發新的理論而扭曲文本詮釋的情形發生，使得我們早年所以為的那些殖民地文本中的「類型化」的分析結論，更形僵固、質變，因而逐漸背離了文學研究的初衷，連帶在殖民地文學研究走失，成為了為「議題」服務的文學研究傾向。

本文在前一階段，以社會學、史學為研究範疇，對殖民地統治史、政策史中可以與文學連結對話的部份——社會事業，進行針對性、脈絡化地整理與爬梳，通過掌握社會事業中的「窮民救助」及「經濟保護事業」兩個項目背後的論述脈絡，理解社會事業作為帝國救助體系的一環，究竟是如何定義、建構其帝國話語中的「窮民」及「失業者」形象與認知系統。

〔註16〕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著、國立編譯館主譯、張君玫譯，《後殖民理性批判——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台北：群學，2006年），頁178。

〔註17〕 同註16，頁201。